

全球投资治理: 发展演进与中国的参与路径

王小龙, 陈伟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在国家投资领域, 发达经济体占据国际投资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迅速增长, 并逐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然而, 国际投资领域却未能建立一个综合性、权威性的全球多边投资协定以及相应的支持机构,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谋求主导新一轮全球投资规则制定权, 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参与主动重构全球投资规则。作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 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投资治理, 而最佳路径就是推动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 全球投资治理; 国际投资; 国际投资规则; 中美 BIT; 中欧 BIT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6)01-0003-08

全球治理的概念是基于全球化、全球问题以及国际格局变革而产生, 它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孕育而生, 到 90 年代才形成一些系统性的概念, 但至今未达成一个统一的、权威性的定义。在冷战即将全面终结之际, 德国政治家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 与此同时,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首次从学术上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 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1]由全球治理概念延伸到全球经济领域诞生了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概念, 所谓全球经济治理指在一部分或全体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合作和共治, 它既包括合作行为和行动, 也包括创立和运行合作机制, 同时也包括相关的各种理念和构想。^[2]

从理论渊源来看, 全球投资治理脱胎于全球治理, 全球投资治理这一概念是全球治理概念被引入到国际投资领域而产生的, 是全球治理的具体化。^[3]与全球治理概念一样, 全球投资治理的概念基于投资全球化、全球性投资问题以及国际投资体系变革而诞生, 它是一个因理解和愿望不同而赋予其不同内容的多元化概念, 又是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概念。

20 世纪末以来, 国际投资活动迅猛发展,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投资规模日益扩大, 几乎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国际投资活动, 国际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纽带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国际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仍占国际投资的主导地位, 但其主导地位正遭受高速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的严峻挑战, 国际投资重心开始“东移”。然而, 当前的国际投资领域体制建构明显落后, 既没有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监管机构, 无法满足国际投资发展需要。

收稿日期: 2015-11-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IRT122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构建与中国的参与战略”(14GWCXXM-14)

作者简介: 王小龙(1990-), 男, 江西吉安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 陈伟光(1963-), 男, 湖北武汉人, 经济学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全球经济治理。

一、全球投资治理框架下的国际直接投资

(一) 国际直接投资总体状况

国际直接投资(FDI)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4]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直接投资(FDI)迅猛发展,其投资规模不断增加,投资区域扩展至全球,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规模由1970年的142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3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0.91%,存量规模由1980年的5993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5.8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71%。如图1所示,步入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21世纪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迅速扩张,存量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流量规模虽然波动较大但是上升较快,2007年达到最高值,金融危机后影响较大但是近两年呈复苏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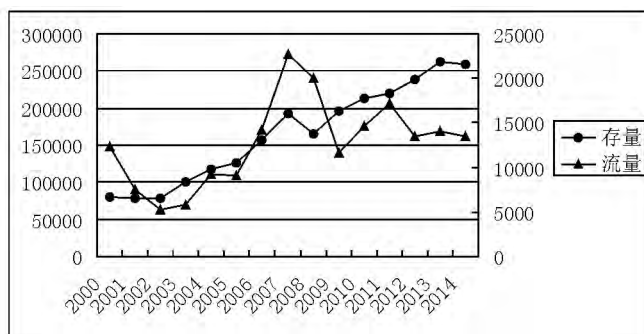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13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和存量变化趋势(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D国际投资数据库

(二) 国际直接投资比较分析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起源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一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开展,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投资,其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能力显著增强,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成为国际投资领域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分析。从绝对量来看(如表1),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规模由1990年的2296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822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5.46%,而发展中国家由113亿美元增加到553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7.60%。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规模由1990年的1946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055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0.32%,而发展中国家由1411亿美元增加到532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6.33%。2014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和存量规模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1.55倍、3.86倍,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

表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规模比较 亿美元

年度	流量			存量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970	142	141	1	/	/	/
1975	286	280	6	/	/	/
1980	538	507	31	5993	5269	725
1985	626	587	39	7780	6943	857
1990	2409	2296	113	20879	19468	1411
1995	3632	3069	563	37860	34573	3286
2000	12412	10907	1506	80084	71001	9083

年度	流量			存量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05	9043	7436	1606	125638	110057	15581
2010	14676	9888	4788	212886	173998	38888
2011	17117	12157	4960	219128	175211	43916
2012	13468	8527	4941	239163	188588	50575
2013	14107	8574	5533	263126	207645	55481
2014	13540	8228	5312	258748	205548	53200

资料来源: 根据 UNCTD 国际投资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从相对量来看, 1990 - 2014 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和存量增速较快, 年均增长率均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如表 2 显示, 1990 - 2014 年, 世界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年均增速分别仅为 7.46%、5.46%, 而发展中国家增速高达 17.40%, 世界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年均增速分别只有 11.06%、10.32%, 而发展中国家增速高达 16.33%。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绝大部分但该比重持续下降, 相反, 而发展中国家该比重较小但持续上升。如表 3 所示,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占世界比重由 1990 年的 95.31% 下降到 2014 年的 60.77%, 存量占比则由 93.24% 下降到 79.44%。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占世界比重由 1990 年的 4.69% 上升到 2014 年的 39.23%, 存量占比则由 6.76% 上升到 20.56%。

表 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年均增长率

年度	流量年均增长率(%)			存量年均增长率(%)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990 - 1995	8.56	5.98	37.88	12.64	12.17	18.42
1995 - 2000	27.86	28.87	21.75	16.16	15.48	22.55
2000 - 2005	-6.14	-7.38	1.29	9.42	9.16	11.40
2005 - 2010	10.17	5.89	24.42	11.12	9.59	20.07
2010 - 2014	-2.00	-4.50	2.63	5.00	4.25	8.15
1990 - 2014	7.46	5.46	17.40	11.06	10.32	16.33

资料来源: 根据 UNCTD 国际投资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表 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规模占世界比重

年度	流量占比(%)		存量占比(%)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990	95.31	4.69	93.24	6.76
1995	84.5	15.5	91.32	8.68
2000	87.87	12.13	88.66	11.34
2005	82.23	17.77	87.60	12.40
2010	67.38	32.62	81.73	18.27
2011	71.02	28.98	79.96	20.04
2012	63.32	36.68	78.85	21.15
2013	60.78	39.22	78.91	21.09
2014	60.77	39.23	79.44	20.56

资料来源: 根据 UNCTD 国际投资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2.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美国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雄厚的经济发达国家, 也是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是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14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已经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FDI), 第一次成为了净值的对外投资的主体。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两大对外投资国, 美国和中国分别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趋势。

从表 4 可以看出, 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还是存量规模, 美国都远超过中国, 例如 2014 年, 美国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为中国的 2.9 倍,存量约为中国的 8.7 倍。从相对量来看,2000 年以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增长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很多年份呈现负增长,而中国呈现出平稳增长趋势,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从对外投资存量占 GDP 比重来看,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 GDP 比重仅为 7%,远低于美国 36%,也低于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 21.4%。因此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表 4 美国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表

亿美元, %

年度	美国				中国			
	流量	存量	流量增长率	存量增长率	流量	存量	流量增长率	存量增长率
2001	1426	23149			69	347		
2002	1248	20226	-12.48	-12.63	25	372	-63.77	7.20
2003	1349	27291	8.09	34.93	29	332	16.00	-10.75
2004	1293	33628	-4.15	23.22	55	448	89.66	34.94
2005	2949	36380	128.07	8.18	123	572	123.64	27.68
2006	154	44703	-94.78	22.88	212	750	72.36	31.12
2007	2242	52750	1355.84	18.00	265	1179	25.00	57.20
2008	3935	31024	75.51	-41.19	559	1840	110.94	56.06
2009	3083	43221	-21.65	39.31	565	2458	1.07	33.59
2010	2879	48096	-6.62	11.28	688	3172	21.77	29.05
2011	2778	45139	-3.51	-6.15	747	4249	8.58	33.95
2012	3867	52495	39.20	16.30	878	5126	17.54	20.64
2013	3669	63495	-5.12	20.95	1010	6136	15.03	19.70
2014	3369	63186	-8.18	-0.49	1160	7296	14.85	18.90

资料来源:根据 UNCTD 国际投资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综上所述,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但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呈现疲软态势,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崛起,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投资格局正发生变化。从投资治理的角度来看,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则系统应反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投资规模现状和发展变化,顺应国际投资格局变革。

二、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结构及其评价

二战后,美国开始全面主导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规则重塑,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传统国际规则或体系相继建立,例如贸易领域有世界贸易组织(WTO)、金融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然而投资领域却未能建立一个综合性、权威性的全球多边投资协定以及相应的支持机构。当前,全球投资治理框架是以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主体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治理协定共存、相互区别又相互重叠的治理体系,它们对促进国际投资发展、维护国际投资秩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都存在局限性。

(一) 双边投资治理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 BIT)是伴随着国际投资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雏形是二战前和结束初期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然后就是美国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首创的投资保证协定,而世界上真正意义的 BIT 是由前联邦德国于 1959 年首创的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5]20 世纪 90 年代,双边投资协定数量继续急剧上升,全球双边投资协定累计总量从 1990 年的 386 项猛增至 1999 年的 1857 项。进入新世纪,双边投资协定增长的速度稍有放缓,但是总量还是不断上升,截止 2014 年底,全球共缔结国际投资协定 3271 个,其中双边投资协定达到 2926 个,约占已缔结国际投资协定的 90%。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经济体都签订了一项或多项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成为当前国际上最重要的投资管理机制。

经过几十年的立法实践,双边投资协定内容不断完善,其核心内容一直是国际投资规则的主流,典型双边投资协定的条款主要涉及投资和投资者、外资准入、外资待遇、征收及其补偿、财产和收入的转移、战乱损失赔偿、代位求偿权、争端的解决等方面。美国 2012 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不仅具有高标准投资保护程度,也

是世界上自由化水平最高的投资规则,是未来 BIT 谈判的方向。但是,双边投资协定对全球投资治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法律效力不足,内容重叠甚至相互冲突,错综复杂,导致治理效果较差。^[6]另外,如果要通过双边投资协定来涵盖世界上所有的投资关系,当前的全球双边投资协定数量严重不足,即使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其治理效果如何也是未知。^[7]

(二) 多边投资治理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功能齐全的多边投资协定。实际上,联合国、GATT/WTO、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都曾试图构建多边投资规则体系,例如《哈瓦那宪章》(1948 年)中关于投资的多边框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提出的《跨国公司行为守则》(1982 年)、OECD 制定的《国际投资和多国企业宣言》(1976 年)和《多边投资协定》(1995-1998 年),以及 WTO 主持的“新加坡议题”,但这些不懈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建立多边投资规则也还是取得了一些有效的成果,其中真正具有约束的公约或协定主要有:世界银行框架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8]

在世界银行主持和领导下,各国于 1965 年正式达成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 ICSID 公约),并依该公约于次年成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该中心是世界银行的五大组成机构之一,主要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专门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性仲裁机构。另外,世界银行于 1985 年通过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下简称 MIGA 公约),MIGA 公约于 1988 年正式生效,并基于该公约成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该机构也世界银行的五大组成机构之一,并具有完全的法人资格,它主要为外国投资者的政治性风险提供担保,此外,还提供咨询和振兴服务、调解争端服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多边投资保险实体。

早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就已经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谈判中。在主要资本输出国的引导和推动下,GATT 将投资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并达成了一揽子与贸易相关的多边或诸边投资协定,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TRIMs 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所达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性、实体性的多边协定,直接规范对货物贸易有限制和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GATS 协定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是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TRIPs 协议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一个国际公约,增强了对于知识产权投资的保护力度。^[9]

就目前而言,现有的几个与投资相关的多边治理规则并不是全球性的、综合性的多边投资。ICSID 公约主要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之间的投资争端,MIGA 公约主要规定为国际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担保,这两个条约都是解决国际投资的某一方面问题的国际条约。TRIMs 协议仅适用于对货物贸易有限制和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将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排除在外,GATS 主要针对服务贸易,涉及投资问题的主要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款,涉及的投资类型仅是商业存在,TRIPs 协议只是涉及到知识产权投资的部分问题,这三个仅仅从贸易角度涉及到相关投资问题,都不是一般的、全面地处理投资问题的多边投资协定。

三、全球投资规则体系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国际投资格局的变革,全球投资规则不得不进行改革或创新以适应新情况新要求。在全球投资规则变革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企图再次主导新一轮全球投资规则体系构建,以维护其霸主地位,而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垄断,积极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以维护其应有的话语权。

(一) 美国谋求主导新一轮全球投资规则制定权

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规则体系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维系和扩张美国霸权治理的全球三大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面临严重威胁,不得不进行改革或重组。作为战后开放和多边国际规则体系的最大获益者,美国已采取行动谋求主导新一轮全球投资规则制定权。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5 年国情咨文中强调“美国应该来书写规则,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在维持美国主导地位这一全球战略目标指导下,美国开始推行“美版投资规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三大国际贸易投资谈判,以及美国 2012 年版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构成了美国 21 世纪新型国际贸易投资战略,凭借其强大的规则优势开启国际贸易投资体系新一轮主导权之争。由美国主导推进的 TPP 旨在成为“21 世纪区域贸易协定的模板”,^[10]力图缔结“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美国总统奥巴马语),历时五年的谈判,2015 年 10 月 5 日,TPP 谈判终于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 10 个泛太平洋国家就 TPP 达成一致;美欧 2013 年成功开启的 TTIP 谈判被誉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意图打造“经济版北约”;PSA 意图成为全球第一个“服务业游戏规则”;美国 2012 年版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边投资协定范本,涵盖的深度和广度对全球投资规则造成了冲击,呈现出美国版的下一代投资规则发展的方向。美国主导的 TPP、TTIP 和 PSA 基本上将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排除在外,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富人朋友圈”,进而以此为基础垄断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攫取更大的“规则利益”。^[11]

(二) 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重塑全球投资治理体系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关键“重塑期”,美国等发达国家正抓紧时间夺取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权,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由“被动”转为“主动”,积极参与制定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这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变革的现实选择和明智之举。

新兴经济体拥有强烈的意愿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参与重塑全球投资治理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相对衰弱,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并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同时,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据《世界投资报告 2015》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 2014 年下降了 16%,但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达到 6810 亿美元,占全球 FDI 流量的 55%,全球前 20 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中有 10 个是发展中经济体。2014 年,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劲升 23%,达到 4680 亿美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全球前 20 大对外投资来源国中有 9 个发展中国家。^①

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改变了国际投资力量对比,但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正面临“改革现有的不公正、不健全的国际投资规则,美国谋求主导新一轮全球投资规则制定权”的双重挑战。为应对这种不利局面,新兴经济体国家采取切实行动参与并推动国际投资规则变革。

四、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路径选择

当前,美国对全球经济治理呈现“进攻态势”,其主导的 TPP 和 TTIP 将中国排除在外,企图主导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的构建,中国面临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边缘化的危险。因此,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作出战略应对。在具体路径上,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最佳路径选择是推动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此外,必须加强国内改革以适应全球投资治理的要求。

(一) 中国与全球投资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

从世界看,2012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 年中国以 1290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从国内看,中国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据统计,2014 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吸引外资总量,中国正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但是,中国对外投资地位与权责失衡,快速崛起的中国对外投资遭遇重重阻力,深受旧一代国际投资体制的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许多投资风险,例如政治风险、经营与管理风险、外汇风险、技术风险、自然性风险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得不得切实有效的保护。另外,美欧主导的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的构建仍将是维护发达国家

^① <http://www.chinanews.com/fortune/2015/06-24/7364046.shtml>.

的对外投资利益为出发点,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的构建活动中去,那么中国对外投资必将为发达国家所压制,这不利于中国从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是履行国际责任的必然选择。在国际上,中国逐渐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主张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作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有责任参与新一轮国际投资体制构建,改变现有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投资旧秩序,以建立新的公平的、合理的国际投资新秩序,从而促进国际直接投资更好更快地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理应站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且有意愿和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投资谈判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将进一步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二)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最佳路径选择是推动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全球投资治理的最佳路径是构建全球性的多边投资协定,但是构建全球性的多边投资协定面临巨大的矛盾和阻力,无法一蹴而就。从现实来看,以双边投资协定为翘板,通过达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来撬动多边投资协定的建立。就中国而言,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其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12]

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中美欧 BIT 谈判很可能会形成未来世界 BIT 的范本。^[13]中美 BIT 谈判于 2008 年 6 月正式启动,2013 年 7 月,中美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实质性谈判,2014 年就 BIT 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于 2015 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截止 2015 年 2 月,谈判已经进行了 18 轮。2015 年 6 月,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双方已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2015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第 21 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在本轮谈判中,双方按照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交换了各自的负面清单改进出价。2015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 BIT 谈判成为习近平主席访美的“重头戏”之一,习近平主席强调“谈成一个双向平衡、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14]此次访美,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意强力推进中美 BIT 谈判,在当前谈判取得的进展和双方 9 月改进各自负面清单出价的基础上,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这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投资协定。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协定,中美 BIT 必将为 BIT 的提供高水平的蓝本,为制定全球投资协定进一步探路,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中美 BIT 谈判完成后,中美两国可以 BIT 为切入口,启动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最终实现自贸区(FTA)谈判。在中欧方面,中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签订了 BIT,但是,中国和欧盟并没有签订 BIT。直至 2013 年 11 月,欧盟成员国正式授权欧盟委员会与中国展开 BIT 谈判,并于 2014 年 1 月进行了首轮谈判,截止 2015 年 9 月,中欧 BIT 谈判已经进行七轮,双方尚未进入文本谈判阶段,中欧正在加紧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定。^[15]

中国、美国、欧盟是全球对外投资的三大核心力量,中美、中欧 BIT 谈判是中国积极主动参与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大战略举措,争取国家投资规则话语权,有利于突破 TPP 和 TTIP 的包围,推动中国新一轮高水平高质量的对外投资热潮。中国可以中美、中欧 BIT 为切入点,最终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但是,在中美、中欧 BIT 谈判中,中国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加强国内改革,必须深化国内改革以应对中美、中欧 BIT 谈判。我国应该从 BIT 谈判文本草拟和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快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利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良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抓手加快改革外资管理体制,抓紧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加紧建立一套自己的高标准高质量的 BIT 范本,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只能进行改革国内,才能在中美、中欧 BIT 谈判中占据先机 and 主导,才能减弱 BIT 谈判所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 [1]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Global Governance, 1995, 1(1): 13.
- [2] 周宇. 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11): 26.
- [3] 陈伟光. 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 若干问题的思考 [J]. 教学与研究, 2014(2): 9.

- [4]李东阳. 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13.
- [5]卢进勇. 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到《多边投资协议》[J]. 世界经济, 1997(10): 33.
- [6]曾华群. 论双边投资条约实践的“失衡”与革新[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6).
- [7]吴其胜. 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 国际关系研究 2014(2): 135.
- [8]李玉梅, 桑百川. 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1): 177.
- [9]刘笋. WTO 法律规则体系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 [10]饶芸燕. 模板、跳板、挡板: 美国战略视角下功能的三位一体[J]. 世界经济研究 2013(8): 9.
- [11]高程. 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12).
- [12]王碧珺.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J]. 国际经济评论 2014(1): 105.
- [13]梁勇, 东艳. 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J]. 国际经济评论 2014(4): 54.
- [14]金旻旻, 谢鹏. 潮涌大洋 中美相向塑未来——习主席访美推动构建合作共赢新生态[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09-25(02).
- [15]江清云.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现状、问题与应对[J]. 德国研究 2014(4).

Glob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Path

WANG Xiaolong, CHEN Weig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eveloped economies ar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keep a high-speed development. Gradually, the gap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s decreasing. However,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as failed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authoritative global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pport agenc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vestment rules, and the emerging economies are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initiative to reconstruct the global investment rules. As the world's foreign investment power, China mu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And the best way is to promote the China-United State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nd the China-European Unio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negotia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system.

Key words: glob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the China-United State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he China-European Unio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责任编辑: 张秋虹)